

文化外交：黎庶昌的使日之饮与中日关系

戚文闯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自 19 世纪后半叶起,中日两国开始互派驻外使节,使团人员在促进中日关系与文化交流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黎庶昌曾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其间他多次举办和参加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接连编辑了多本与之相关的宴会诗集。其使日之饮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而且将文化与外交相结合,促进了中日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关键词]驻日公使;黎庶昌;中日关系;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6-0092-07

Cultural Diplomacy: Li Shuchang’s Mission to Japan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QI Wenchuang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China and Japan have started to send diplomatic envoys to each other and the staff of the mission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promo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cultural exchanges. Li Shuchang served twice as the minister to Japan, during which he held and participated the banquet poetry gathering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officials and literati for many times, and edited many books of banquet poems related to them. This not only carried forward the oriental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e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but also combined culture with diplomacy, and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Key words:the minister to Japan; Li Shucha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ultural exchange

19 世纪 70 年代中日互遣驻外使节之后,晚清政府派往日本的外交官员大多是文人学者,他们在文学、诗歌、书法等方面也都颇有造诣。明治维新后,日本人虽然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但是崇尚中国文化、热衷于汉文诗歌的日本人仍然不少,尤其那些日本贵族、官僚、文人更把吟作汉诗作为自己文学修养高低的重要标志;因而中国公使馆也就成了对日本汉学者、文人、官僚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中国驻日使节人员与日本政府官员、文士之间经常聚

会、互相宴请,席间双方进行应酬、“笔谈”(中日两国同属于汉字文化圈,日语中也保留有不少汉字,而且许多日本官僚文士也都会读写汉文。因此,当两国文人相遇时,尽管双方语言不通,但却可以通过用笔书写汉字的方式来进行交谈,通常称之为“笔谈”或“笔话”,这也是中日文化交流中两国官僚文人交流的一种特殊形式)活动。当适逢佳节,中日双方官僚文人或偕同赏樱,或登高、吟诗对唱,留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诗篇,其既是宝贵的文学遗

收稿日期: 2017-09-28

作者简介: 戚文闯(1989-),男,河南开封人,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

产,又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篇章。

一 使君会客作重阳——黎庶昌初渡日本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驻日期间,公使馆人员与日本官僚文士的交往,一般规模较小,多为私人交游或在小型的宴席集会上互赠诗篇。日本人源辉声编撰的《大河内文书》记录了首届驻日使团与日本文士在东京向岛聚会赏樱饮酒赋诗的场景。1878年4月中旬,正是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日本贵族源辉声邀请了驻日公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等驻日使团人员和一些日本文士,一同来到东京隅田川畔的向岛赏花饮酒。席间中日两国人士观樱赋诗,彼此吟对唱和不断,场面极为热烈,中国官员称此为“海外看花第一遭”^{[1]257}。到了第二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使日时期,中日两国官僚、文士交游的规模进一步扩大,黎庶昌“驻日期间,以文章辅外交,与日朝野士大夫之醇于汉学者相接纳,文酒酬酢”^[2]。他定期举行诗歌唱和活动,并接连编辑了多本宴会诗集,为后人了解中日之间这些文化交流活动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黎庶昌(1837—1896年),字莼斋,贵州遵义沙滩人,是我国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和散文家,曾先后随郭嵩焘、曾纪泽、陈兰彬等出使欧洲,历任驻英、德、法、西等国参赞。自光绪七年(1881年)之后,他先后两度出任驻日公使,在日本长达7年有余,结交了许多日本官僚、文士等日本友人,“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布衣野老之伦,往往歌吟啸呼,诗酒淋漓,恣而不厌。”^[3]黎庶昌也曾主持过多次中日官僚、文人宴饮诗会,驻日使团其他成员也有不少人参加,如杨守敬、姚文栋、孙点、黄超曾等,可谓人才荟萃,盛况一时。黎庶昌在《宴集三编统序》中对两度赴日期间的宴饮诗会作了综述:“余以光绪七年冬奉使日本,有与国同文之乐;暇辄与缙绅儒流叙交会饮,诸君子或为诗文以张之。而上巳、重阳,每岁必举特别之会,使与兰亭、龙山相配。光绪十三年,余奉命再至。国好日密,驳驳乎有唐世遗风。愈益无事,益得与诸君子道故旧、为宴乐。于是,会者愈繁,诗与文日益多;岁不下数十聚,或有作,或无作。随员孙子君异皆理而董之,使自成帙。”^{[4]120}

黎庶昌使日期间,中日两国官僚文士间举办了多场宴饮诗会,经过时人编辑整理出版的诗集就达十几本。第一次诗会是在1882年(光绪八年壬午)的重阳节,黎庶昌在《重九燕集诗序》中记载了此次

宴会的参加人员情况:“光绪八年壬午重九,余会日本人士于上野精养轩,修登高约也。明年癸未,再举斯会,益充其人。东士来与者,曰森立之、曰重野安绎、曰长松干、曰岩谷修、曰中村正直、曰川田刚、曰向山荣、曰长松干、曰藤野正启、曰三岛毅、曰龟谷行、曰宫岛诚一郎、曰石川英、曰森大来。合使署人员凡二十一人,同会署后之西楼使署。”^[5]参会的日方人员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学者、汉学家。

中日两国文化渊源深厚,也都有重阳节登高望远、饮酒赋诗的传统。“登高之俗,用秦相袭,所从来旧矣……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宜有以张今日雅者。”^{[4]4}因此黎庶昌选择在重阳节举行中日官僚、文人交流会,并约定明年癸未再举办宴会。黎庶昌在席上吟诗“重阳佳节古今同,异地浑忘在客中。招致一时名下士,仰希千载古人风”,宾客争先唱和赋诗,“及夜,酒罢,各各尽欢以散。汇其诗,得五十有二首。”^{[4]4}此次宴会上所作的52首诗篇,后来由使馆的随员姚文栋编辑整理为《重九登高集》。

1883年(光绪九年癸未)重阳节,黎庶昌在永田町中国公使馆的西楼举行宴会,“莼斋黎君驻节于此三年,每遇重阳辰,召集都下知交僚属陪焉。”^{[4]5}此次重阳之会邀请了石川英、中村正直、重野安绎、长冈护美、宫岛诚一郎、岩谷修等十多位日本友人,另有杨守敬、姚文栋等八位驻日使团人员作陪。宴会上中日双方人员赋诗对唱,场面热闹非凡。重野安绎在《癸未重阳宴编记》中谈及了此次宴会盛景:“飧饌未终,或将饱则扬;盘有余味,欲归遗细君。笔语传意,杂以谐谑。同文之交,嗟乎,可乐也哉!”^{[4]5}

藤野正启则谈及了中日两国友好交流的历史及其今昔变化:“昔者,我与隋唐通也,使聘往来,概无虚岁。每使至,赐宴鸿胪之馆,选文学士接伴诗酒应酬,两情以畅……今则万国交通异色殊俗之人,杂然并进,故我同文之国,意乞相投,情实等一家。况黎君器宇恢宏,不设城府,开襟接纳,酬答如响,是以宾主相忘,欢然无间。昔时之宴,岂能至此哉!俯仰今昔,抑何吾生所遭之多幸也。”^{[4]6}森立之也作诗一首以倡宴会之同文之乐:“垂老何如好宿因,重阳今日醉清醇。休吟他席他乡句,尽是同文亚细人。”^{[4]12}宴会之中的中日官僚文士推心置腹、情真意切,抒发两国友好之谊。

此次宴会共得诗篇50多首,最后由使馆随员孙点整理编辑为《癸未重九宴集编》。“这部诗集

书皮用日本纸,书页用中国宣纸。封面由日本诗人岩谷修题签,而封里则由中国公使黎庶昌署检,从内容到形式,都体现了中日友好合作的精神。”^{[1]260}

1884年(光绪十年甲申),黎庶昌因丁母忧而回国守丧,徐承租继任驻日公使,但与日本官僚、文士的宴饮活动并未在徐承租上任后得以延续,一直等到1887年黎庶昌再度出任驻日公使之后,这项文化交流盛会才再度进行。

二 重持龙节到扶桑——二度使日之饮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戊子)10月4日,日本官僚、文士重野诚斋、井上子德等人为了欢迎黎庶昌再度赴日,“张宴于中洲枕流馆,贺清国钦差大臣菴斋黎君再任也。”^{[4]70}南摩纲纪首先以“喜黎公使再驻我国,邀宴于枕流馆,赋呈请正”为题作诗一首:“星槎万里驾长风,良缘重结东海东。新知不若旧知好,虽俗则殊文则同。米欧工技非不妙,邹鲁遗训道独崇。鹿鸣歌罢嘉宾醉,式宴以散情何穷。愿得唇齿长相赖,共奏墙外御侮功。”^{[4]75}

诗中除了对黎庶昌再度使日表示欢迎外,也强调虽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努力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但中日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希望中日联合共同抵御外敌。黎庶昌也“即席赋此博粲”作诗表示感谢:“高馆枕流江上雄,坐中豪士尽元龙。吟怀喜接旧时雨,爽气披迎沧海风。国异不曾文字异,洲同尤愿泽袍同。愧余忝任皇华节,结好惟凭信与忠。”^{[4]79}诗中也表现出黎庶昌希望在“信与忠”的基础上与日本友好相处,“泽袍同”,共御外敌。

1888年10月13日重阳节,黎庶昌在公使馆又一次举行宴饮诗会,出席者主宾计32人,席间饮酒赋诗,“主宾无猜,胥忘形迹;酒食为乐,不责倡酬。去市远而兼味不难,入夜分而名篇杂出。众音合奏,是承平雅颂之声;无体不收,极浓淡清奇之美。斯为盛矣,谁其继之!”^{[4]33}黎公使在诗会上“为诸公先引,并以博粲”,首先赋诗:“此日重阳寻旧盟,同文于我似鸣嚶。高秋云物归三岛,异地冠裳集两京。水击息鹏搏海运,醪醇斟兕饮人情。诸君满腹琼瑶什,槃敦之间一再赓。”^{[4]43}

日本文士也纷纷赋诗唱和,长冈护美“即席赋谢”作诗一首:“星槎两度问通津,海外原非倾盖新。落帽正逢黄菊节,举杯不羡白衣人。登高能赋联吟侣,接壤论交有善邻。莫道天涯多感慨,吾曹愿作弟兄亲。”^{[4]43}

宫岛诚一郎也赋诗《次和黎大使原韵鸣谢》答谢:“交邻有道两心藏,欲和最难金石章。醴酒浇肠排磊块,使星照座放光芒。七年佳节欢三度,此夕群贤醉一堂。何料大邦文字友,重持龙节到扶桑。”^{[4]50}

从黎庶昌和日本友人的诗中可以看到,双方都提到中日间文化交流的渊源,如“同文”“善邻”“弟兄亲”“文字友”等词,都意在抒发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之友好关系。席间所作诗篇,最后由使团随员孙点整理编辑为《戊子重九宴集编》。

188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黎庶昌与日官僚、文士间先后举行了3次大规模的宴饮诗会。这三次诗会上的唱和诗篇最后也由孙点分别编辑成《枕流馆集》《修禊编》和《登高集》,并将此3本诗集合编为《己丑宴集续编》。

1889年2月18日,日本官僚在中洲枕流馆设宴招待黎庶昌及使团人员。宴会之中,中日双方人员不免谈论起当时中日关系之形势与看法。日本文士盐谷时敏追溯中日两国悠久的文化交流,认为其间虽有矛盾与争战,但两国交流却不曾中断,和平交往仍是主流,“顾敝邦之与贵国交通,实创于一千余年之前。然时有理乱,运有否泰,故其交不能无通绝”^{[6]6},并认为“明治中兴以后,始各遣公使驻扎其都,交邻之道于是大备。是千余年来通绝始末之大概也”^{[6]6}。同时他也对当时的中日关系发表了看法:“夫千余年来,师资相益,其亲好敦睦同也。今也,宇内大势一变,世运大进。昔日视为遐邦者,今则为比邻;昔日视为比邻者,今则为一家之人。而美欧各国争雄竞强,或藉兵威吞灭弱小,或因贸易网罗货宝。凡在我亚洲同气同文之国,同宜弃小忿、捐细故,大张辅车唇齿之势。然则,敝邦之与贵国可相亲好敦睦,有什倍于昔日者,而宴私交游之于其间,诚不为无助也。”^{[6]6}

不难看出,参加宴会的日方官僚、文人提倡在面对欧美列强争雄、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中日双方应该“弃小忿、捐细故”,同舟共济,“大张辅车唇齿之势”。

同年3月23日,黎庶昌在芝山红叶馆举行盛大的“修禊”(中国古代风俗,每逢三月三日到水边嬉游,以消除不祥,叫做“修禊”)之宴。“大清钦差大臣黎公为春季亲睦会,觞吾邦文士于此馆。会者凡三十余人。”^{[6]19}故此宴会又称为“春季同人亲睦会”。黎庶昌首先“于红叶馆为春季同盟亲睦会,赋

诗一章呈席上诸君雅正”，并以此会暗比王羲之等人的兰亭之会：“兰亭寂寞已千载，胜集今从海外探。曲水杯觞余韵在，蓬瀛丝竹旧时谐。论交须订亚细亚，修楔还同三月三。红叶枕流成故实，为添诗料满东南。”^{[6]25}

日本元老院议官长冈护美也作诗和韵，表达中日友好之愿望和参加宴饮诗会的喜悦之情：“万里钦君使节持，瀛东重挹旧丰仪。敦槃谊结当年好，缟带欢联昔日知。北海清樽娱永昼，西园雅集正芳时。高楼秉烛心期快，喜读筵前唱和诗。”^{[6]25}

与黎庶昌在琉球问题交涉中打交道的日本外务省官员田边太一也以“红叶馆酒间次黎星使韵”作诗一首：“惊见新篇凌李杜，骊珠颌下手能探。接人气似春风遍，奉使胸教公法谙。唱和阿谁争七步，笑谈有客过更三。愧余老欠抢榆力，空羡垂天鹏翼南。”^{[6]26}

同年10月3日，适逢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黎庶昌又在红叶馆举行重阳节登高诗会。出席此次重阳诗会的中日人员有44人，“是日会者：主则星使以下孙君异等九人；客则大鸟公使至井上子德数十人；而朝鲜公使金君亦与焉。献酬交错，歌舞互起，不复知秋色之可悲也。”^{[6]83} 汇编《红叶馆登高集》诗集的使团随员孙点详细列出了参会人员爵位、官职等：

己丑重九宴集会者姓氏录^{[6]75-78}

来安孙点君异甫录

大鸟圭介，字如枫，东京人，从三位，勋二等，元老院议官，现充出使我国全权公使。

长冈护美，字云海，东京人，从三位，勋二等，男爵，元老院议官，前充出使荷兰全权公使。

宫本小一，字鸭北，东京人，从三位，勋三等，元老院议官。

田边太一，字莲舟，静冈人，从四位，勋三等，元老院议官。

长松干，字秋琴，山口红人，从四位，勋三等，元老院议官。

中村正直，字敬宇，东京人，从四位，元老院议官，文学博士。

金井之恭，字梧楼，东京人，从四位，勋四等，元老院议官。

岩谷修，字古梅，滋贺人，从四位，勋四等，元老院议官，帝室制度取调委员。

重野安绎，字成斋，鹿儿岛人，从四位，勋六等，

元老院议官，文学博士。

期而未至者，附志于后：

副岛种臣，字一一学人，东京人，正三位，勋一等，伯爵，枢密院顾问官。前出使我国全权公使。

胜安芳，字海舟，东京人，正三位，伯爵，枢密院顾问官。

元田永孚，熊本人，正三位，勋三等，枢密院顾问官。

从参会人员名单可以看出，受邀请参加宴会的日方人员多有官职，在政府中任职者居多，其中就有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元老院议官长冈护美、宫本小一、田边太一、金井之恭、中村正直、重野安绎、岩谷修、长松干和其他官员、文士等；另外还邀请了朝鲜驻日公使金嘉镇；中方人员则多为使团随员和来日游历官员。

日本海军省属官西岛准之助盛赞此次宴会绝非仅仅是一次宴游：“今黎公则集三邦名士于一馆之上，宴游之大，献酬之盛，虽谓彷彿西园雅集而超乘譔园宴会可矣……抑政教之兴废隆汗，征乎名贤之离合聚散；而名贤之离合聚散，即同政教之兴废隆汗而知之。则今日之会之盛，其所关系特不止乎一时之宴游也。”^{[6]82} 日本内阁属官盐谷时敏在《己丑重阳宴集序》中评论此次诗会“地据芝陵之首，人聚三国之英，登高之会于是为盛”^{[6]83}。日本元老院议官重野安绎则以“黎公使莼斋先生每岁重阳招邀同人。今兹己丑，开宴红叶馆，先生有诗，次韵以奉答，是日，我驻清公使大鸟氏及朝鲜公使金氏亦来会”为引子，对中日朝三国公使齐聚一堂，为三国之和平“善邻”之局面所作出的贡献和表现的才华，甚为称颂：“一堂偶聚三星使，九日同倾百酒杯。至竞善邻为国宝，果然圣主得贤才。”^{[6]83}

三 临行一语堪持赠——届满归国之饮

1890年（光绪十六年庚寅），是黎庶昌担任驻日公使届满之年，黎庶昌在《宴集三编统序》中言：“今年冬，余任满将归国，又有饯别、留别之宴。诗文之外，踵而为图；酬唱倍于曩昔，非一编可容。”^{[4]120-121} 故中日官僚、文人之间互办的唱和诗会，也更加隆重、频繁。黎庶昌为了尊重日本学习西方而颁行的新历法，也“入乡随俗”，将原本阴历三月三日举行的“曲水之宴”改在了阳历3月3日（阴历二月十三日）。日本文士西岛醇在《红叶馆宴集记》中言：“今兹庚寅三月三日，大清节使黎公

莼斋先生,招集都下名士,开宴于红叶馆。盖修同文之会也。”^{[4]124}宴席上黎庶昌首先赋诗一首,强调中日友好关系与两国友人的同文之乐:“薄海尽销兵革气,吾侪珠玉任蒐探。朋来簪盍同文乐,博望查通旧路谙。西极戴鳌惟柱八,东归零雨易年三。便瞻北斗趋北京,更向黔南返播南。”^{[4]127}

随后,席间日本文士纷纷赋诗唱和。元老院议官长冈护美赋诗云:“萸宴西风开九九,流觞曲水正三三。年年雅会同修楔,喜诵瑶篇得指南。”^{[4]129}与黎庶昌、黄遵宪等使团人员关系要好的宫岛诚一郎赋诗云:“善邻应喜联邦两,奉使只希持节三。”同时宫岛还在诗中提出,在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中,中日两国必须利用西方先进科技,寻求自身富强之术:“弱小何曾公法问,富强初此战图谙。火船车利功无匹,步骑炮军兵用三。兴亚要须通海陆,振张威武镇东南。”^{[4]132-133}陪宴的驻日使馆参赞陈明远也赋诗强调中日两国唇齿相依,应摒弃隔阂矛盾,联合抵御外敌:“忽闻莺舌弄绿杨,春江肥鰠思一尝。及时行乐乐未央,唇齿之交不可忘。方今边界多虎狼,莫使处人笑阆墙。床头我有旧干将,年来怀袖敛锋芒。使轺两度忝赞襄,愧无奇策献庙廊。亚细亚洲本同疆,中间只隔一海洋。”^{[4]141-142}此次宴会所得诗篇,最后由使团随员孙点汇编成《修楔编》,后被收入《庚寅宴集三编》一书之中。

同年4月,正值樱花盛开之季,日本东京上野公园风景美不胜收。长冈护美、重野成高等日本官僚、文士,为答谢黎庶昌3月3日举办的“曲水之宴”,“长冈、重野两先生暨诸子宴我节使黎公于上野樱云台,使署诸人皆与宴。”^{[6]126}樱云台前车水马龙,参加宴会的中日官僚、文士达上百人之多,盛况空前。当时,黎庶昌则刚从名古屋参观日本陆军演习归来,听闻驻华公使大鸟圭介在京宴饮,便匆匆赶来参会,并赋诗抒发近日所感:“笠山观战日喧胚,马首新瞻岳雪回。草色辨天迷路曲,樱花终日绕云台。吾侪报国文为辅,邻境交欢德乃媒。寄语燕都持节使,定知同此好颜开。”^{[6]117}

公使馆参赞陈明远在席上分别以“樱”“云”“台”三字为诗韵,一口气作了12首绝句,博得与会日本诗人之赞叹。诗中有“同洲两国夙同文,坛坫敲诗到夜分”以及“曾闻徐福住蓬莱,后二千年我又来”等句。日本元老院议官长冈护美也席上赋诗抒怀中日友好之愿:“论交倾盖应偕乐,奉使乘槎几壮游。东海鸥盟君莫忘,睦邻深谊在吾州。”^{[6]128}副岛

种臣也以“窃披私衷以呈清国公使黎公”为引,赋诗表达中国两国和平之愿:“二国媾和世泰昌,韶气融通日丽光。櫻桃李杏齐时芳,惠风宛转花披猖。”^{[6]128}日本汉学家岛田重礼席间也强调中日两国关系为兄弟之交、唇齿相依:“良辰依旧开高会,畅叙幽情韵共探。四海兄弟交要密,两邦唇齿意相谙。”此次宴会上所得诗篇,最后由随员孙点汇集成《樱云台宴集编》。

同年10月22日,适逢重阳节,“黎公任满将去,适会阴历重阳,公命招饮尝所往来文士骚客,于东京红叶馆,且告别。”^{[4]183}这也是黎庶昌举行的第六次重阳节宴饮诗会,也是他离任前的最后一次重阳节诗会,因此他以“修登高约,兼为留别之会”为引赋诗,期盼中日两国能以诚相待、友好相处:“班荆倾盖尚萦思,何况联欢六载移。馀事敦槃寻理约,国盟金石寓深期。交邻有道诚能久,时局就平今可知。归去大瀛衣带限,望君频为寄新诗。”^{[5]188}

应邀参加此次重阳诗会的日本官僚文人有六七十人之多,多是黎庶昌的故交旧友,大家席间纷纷赋诗表达留别之意与中日两国友好交流之请。长冈护美赋诗言:“两立无猜晋楚思,星轺东驻岁迁移。流觞上已游犹昨,落帽重阳会此期。时局就平资奉使,人生恨别悔相知。明年今日登高处,萸插还吟怀旧诗。”^{[4]189}

田边太一赋诗言:“行旌两度驻扶桑,缟带情深共举觞。唇亡交以千载旧,苔岑契有两情知。”^{[4]192-193}岩谷修赋诗云:“唇齿棚依旧盟在,金兰永结两心知。写情赖有同文字,去雁来鱼辄寄诗。”^{[4]195}日本汉学家关义臣还赋诗表达了中日结盟的愿望:“才名德望动扶桑,邻国交欢即滥觞。余事风流推博雅,每年嘉会作重阳。同文订约谊相合,时局就平谋式臧。蘸甲何辞今夕醉,归期在近见眉黄。我送大宾无所思,难回世变与风移。鲁欧(指的是俄国及欧洲列强)威武谁能豫,清日同盟益可期。”^{[4]197}

参加诗会的中国文人们也作诗阐述中日两国间的友好交流。公使馆参赞陈明远赋诗云:“两番持节联盟好,三国簪萸祝寿臧。此是亚洲全盛会,岂徒诗酒压苏黄。”^{[4]233}钱德培赋诗言:“言语虽殊情则同,三年交谊客途中。中敦槃更有诗文,乐翰墨缘结海东……秋菊春樱共酒筵,中东唇齿合相联。临行一语堪持赠,亲睦年年比石坚。”^{[4]233}蒋子蕃赋诗言:“两国同文联旧雨,情于谈处妒花黄。窃

愿国盟垂永永,欲谈时事转期期。”^{[4]239}此次重阳诗会所得诗篇,也由使馆随员孙点汇编为《登高集》,后也被收入《庚寅宴集三编》中。

临近黎庶昌届满归国之期,日本的官僚、文士纷纷设宴送别,并赠送黎庶昌宝刀、美人图。“刀以太庙神宝余铁锻制,锋叶两面有富士山真形,淬之不灭;图即小苹女史所绘汉妆手持仙桃,殆神女也。”^{[4]267}黎庶昌在诗中一再强调应以大局为重,加强中日友好和睦关系:“清谭一席到瀛垓,岂为离序惜酒杯。大局至关吾辈事,好怀须向素心齐。”^{[4]271}日本明治天皇“帝师”元田永孚赋诗期盼中日两国

能长久和平相处:“同文同德长应乐,他席他乡何不減。但惜相逢忽相别.异时相忆马元黄……五洲交会夙云变,两国和盟天地知。”^{[4]271}席间其他中日两国参会的官僚文士也赋诗对唱,这些诗篇最后也由孙点汇编成《题襟集》,后也被收进《庚寅宴集三编》里。在黎庶昌归国之时,为其送行之人不计其数。“去之日,攀送者塞巷盈途,或追践至数百里。泰西各国使臣啧啧称羨,谓为从来使臣返国所绝无也。”^[7]

黎庶昌驻日期间宴饮诗会及诗集如表 1 所示。

表 1 黎庶昌驻日期间宴饮诗会及诗集一览表

时间	地点	主办者	出席人数	诗集	编者
1882 年 10 月(重阳节)	上野精养轩	黎庶昌		《重九登高诗》	姚文栋
1883 年 10 月(重阳节)	永田町公使馆西楼	黎庶昌	21	《癸未重九宴集编》	孙点
1888 年 10 月 4 日	中洲枕流馆	日方(重野成斋等人)	24	《枕流馆宴集诗编》	孙点
1888 年 10 月 13 日(重阳节)	霞关公署	黎庶昌	32	《戊子重九宴集编》	孙点
1889 年 2 月 18 日	中洲枕流馆	日方		《枕流馆集》	孙点
1889 年 3 月 23 日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30 多	《红叶馆修禊编》	将此三本诗集合编
1889 年 10 月(重阳节)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44	《红叶馆登高集》	为《己丑宴集续编》
1890 年 4 月 8 日	上野樱云台	日方	约 100	《樱云台宴集编》	孙点
1890 年 3 月 3 日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40 多	《修禊集》	
1890 年 10 月(重阳节)	芝山红叶馆	黎庶昌	70	《登高集》	
1890 年 9 月 20 日、10 月 6 日、 11 月 23 日	芝山红叶馆	日方			孙点 将此三本诗集合编
1890 年 10 月 26 日	养浩堂	宫岛诚一郎		《题襟集》	为《庚寅宴集三编》
1890 年 11 月 3 日	上野樱云台	日方			
1890 年 11 月 22 日	霞关	黎庶昌			

资料来源:黎庶昌等,《黎星使宴集合编》,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年版;黎庶昌等,《黎星使宴集合编补遗》,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2000 年版。另:表格中有多处出席人数为空白,系缺乏相关资料,无法查实。

四 结语

黎庶昌在担任驻日公使期间,多次举办和参加中日官僚文士宴饮诗会,席间大家互相切磋诗歌、文学、中日关系等方面的见解,而诗是他与日本朝野文士之间交流的主要形式。他通过以诗会友、以诗抒情,不但弘扬了东方传统文化,推动了中日间的文化交流,而且也加强与日本官僚文士之间的互相了解,与多位日本朝野文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其文化与外交相结合的文化外交理念在日本的成功运用,促进了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关系的发展。

日本官僚、文士对黎庶昌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

和推动中日关系友好上作出的贡献给予很高评价。日本元老院议官重野安绎高度评价黎庶昌说:“今上登极,首修邻交,派遣大使;清廷亦有钦差之举。尔后旌节交递,而黎君独前后两任,鞅掌拮据,赞画有法,两国之交,赖以益归和好。天子嘉尚,叙勋一等,赠旭日大绶章。”^{[4]254}依田百川亦言:“钦差大臣蒞斋黎二使吾邦,驻扎东京数年,与朝廷大臣相交以礼,进退周旋,莫不由道焉。而亦好优遇士人,文字往复,不问亲疏。是以我学士大夫略涉文墨者,以不知黎公为耻。”^{[4]183}从以不知黎庶昌之名为日本文士之耻,也可以看出黎庶昌在日本文化界的地位与影响力。日本东宫侍讲三岛毅在评价黎庶昌

贡献的同时,还专门纠正了某些人认为黎庶昌作为公使不忙于外交政务,而热衷于宴饮诗会,无益于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误解,认为宴饮诗会等“文字之饮”对于国家交往、两国关系有大用处:“世或谓使臣公务之剧,何为此无用文字之饮?是大不然。盖两国使臣之相交于鸿胪,修礼容,慎辞令,专保护国体;甚则设城府,饰边幅,适足以生猜疑;而情好则不通。明治以还,我与清国虽寻隋唐旧盟,使臣往来,不免猜疑者殆数年。自黎公使来,有见于此,务为风流文字之饮,以通情好。夫知文字者,皆一国士君子也。士君子苟通情好,下民岂不风靡!是以彼此欢洽,互知无他心;唇齿相依之交,日周月密,有隋唐旧盟不足复言者。然则风流文字之饮,有益于国家交际,不亦大乎!”^{[4]257}

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以及中日两国“提携”之论也得到了许多日本有识之士的响应。星野恒也倡言中日联合之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我之与清国同文同伦,志向不殊;朝鲜、安南诸国,亦皆莫非同臭味。苟相与通规约,同心协力以率先,宇内四方万国,将必有风动而响应者矣。”^{[4]262}这为黎庶昌与日本在琉球和朝鲜问题上的交涉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他也因此从日本友人处获取了极为可贵的外交情报。在朝鲜“壬午兵变”发生后,“日本将袭朝鲜,庶昌电请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计。师至,日舰知有备,还,言归于好。”^[8]日本将要出兵朝鲜的情报就是黎庶昌在与宫岛诚一郎交谈中获得的。“庶昌心异其言,使人侦知其事,密电驰报”^[9],从而破坏了日本出兵占领朝鲜的图谋。黎庶昌的文化外交也极大地推动了其在日本搜寻散佚汉籍、编撰《古逸丛书》的活动。当他在编撰《古逸丛书》遇到困难时,一些日本王公大臣、图书收藏家等也都十分乐意拿出收藏的汉籍供黎庶昌参考。被学术界誉为“海外奇宝”的《古逸丛书》的最终编印出版,除了黎庶昌、杨守敬等人的自身努力外,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日本朝野官僚、文士的帮助。

虽然黎庶昌等人通过“文字之饮”大力鼓吹中日两国睦邻友好、中日联合,并以文化外交的个人

涵养魅力和外交能力赢得了日本朝野文士的尊敬和赞誉,同时不少日本官僚文士也同样怀着中日唇齿相依、联合抵御外侮、共图富强的良好愿景,但终究难以改变清王朝集团腐败的现状,也终究难以改变日本统治集团侵略扩张的既定国策。日本自明治维新后逐渐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大陆政策”“征韩论”“琉球处分”等渐次出台,黎庶昌与日本官僚、文士这些短暂的文化交流难以改变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既定方针政策,大气候使然也。19世纪90年代初,中日矛盾冲突激化,终因朝鲜问题而爆发战争,即中日甲午战争。总之,在内有清王朝面临外部列强侵略腐败无能、外有日本侵略扩张步步紧逼的大背景之下,从事对日外交的黎庶昌所作出的各种努力也就显得无奈和无力,因为当时清王朝的衰败是绝非个人之力所能扭转的。

参考文献:

- [1] 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 [2] 黎庶昌.古逸丛书:第1册[M].郭璞,注.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出版说明.
- [3] 黎庶昌.养浩堂诗集第二集序[M]//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五.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7:396.
- [4] 黎庶昌.黎星使宴集编[M].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 [5] 黎庶昌.重九燕集诗序[M]//黎庶昌.拙尊园丛稿卷六.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1967:457.
- [6] 黎庶昌.黎星使宴集编补遗[M].孙点,编次.黄万机,点校.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
- [7] 黄万机.黎庶昌评传[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170.
- [8] 赵尔巽.清史稿卷446·黎庶昌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481.
- [9] 冯楠.贵州通志·人物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182.

责任编辑:黄声波